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5.004

论苏轼作为归隐之道的自然审美

刘 汉 君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济南 250100)

摘要:苏轼的自然审美超越了对审美对象的单纯观照,而指向对归隐自然家园的审美追求,是他归隐自然的实现途径。他之所以有如此深沉的归隐之念,不只是由于官场倾轧,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对争夺功名的厌倦,对闲适安逸的自然审美生活的崇尚。在身居高位时,他通过自然审美短暂地感受到归隐自然的乐趣,并发誓最终要归于自然之中;在遭黜贬谪时,他通过自然审美纾解了被贬的悲剧情绪,转贬谪之苦为归隐之乐,真实地感受到了自然家园之适意。苏轼的自然审美理念对当代自然审美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具有一定生存哲学意义。

关键词:苏轼;归隐之道;自然审美;仕宦;贬谪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5-0022-09

归隐,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主题,自《诗经》开始,便常有以怀归思乡为主题的作品。后世文人,或因政局动荡不安,或因厌恶名利场的争斗,多选择远离朝堂,退归林泉,在官场之外、自然之中享受审美之趣。随着唐宋官僚体制的逐步完善,宦游成为常态。以苏轼为例,他做过凤翔、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市)等多处地方官,又经历了两次贬谪,虽游遍天下,却最终未能真正归隐。不过,他并未因此丧失归隐之心。综观苏轼以自然审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可发现一个现象:每当他能够充分地享受自然审美乐趣时,他总会产生归隐家园之心。因此,可以认为:自然审美已成为苏轼归隐自然的实现途径。苏轼的理想追求是归隐自然家园,这使他的自然审美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审美观照,走向了人融入自然之中的审美体验。在身居高位时,他通过自然审美短暂地体会到归隐之趣;在遭黜贬谪时,他又通过自然审美转谪居之苦为隐居之乐,获得了乐观的生存状态。

一、“高遁此心甘”——苏轼的归隐之道

苏轼为何拥有如此深沉的归隐情怀?仅以政治倾轧、朝堂失意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因为苏轼在早年尚未进入官场时,就已经有了对官场生活的

厌倦,对自然生活的向往。如,他在早年南行途中作诗《夜泊牛口》云: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嚶,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里,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1]9-10}

牛口的生活如此和谐、美好,人人相处融洽,虽然远离城市繁华,但村民安贫乐道;尽管朔风吹破茅屋,但正可以赏月观星。身处深山,与麋鹿为友,却自得其乐,不以身落蛮荒、生意不佳为陋。看着如此闲适的生活场景,苏轼不禁感叹,田园生活如此美好,我何必汲汲奔走,苦苦追求功名利禄呢?虽不排除他身具舍身报国之心,但自不安于贫贱,反而受富贵诱惑,或许是他外出为官的重要原因。苏轼诗《巫山》云:“神仙固有之,难在忘势利。贫贱尔何爱,弃去如脱屣。”^{[1]36}换言之,妨碍他归隐山水田园的阻力不仅仅是官场的倾轧,还有利欲诱惑的束缚,以及对贫贱生活的鄙弃。因此,可以看出,苏轼内心的矛盾不仅是进取官场与

收稿日期:2024-0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生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创新研究”(23&ZD280)

作者简介:刘汉君(1994—),男,山东省济南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退隐自然,更重要的是在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传统价值观,与回归最自在、最本真的自然审美存在状态的愿望。尽管他也心向官场,试图为国奉献,但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始终是回归到一个毫无机心、安贫乐道、逍遥洒脱的自然审美家园。王水照指出:“他的一生,无论是立朝为宦,抑或是贬谪蛮荒,一贯珍视自身的生命存在,努力超越种种窘逼和限制,执着于生命价值的实现,获取生活的无穷乐趣和最大的精神自由。”^{[2]46}人生目标的确立,必定会对他自然审美的理想追求产生影响。在他的自然审美意识中,更好地欣赏万物只能是自然审美最初级的目的,而体会归隐自然的存在之趣,才是自然审美的根本旨归。

纪昀批评《夜泊牛口》的后半段沦为“俗迳”,并认为“凡游眺山水之诗,此意摇笔便来,切宜避之”^{[3]1854}。其实不然。苏轼有着深沉的归隐之念,这一念想源自他对故乡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他本真个性的完美显露,绝非随笔写之,作为读者更不应随意视之。

“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4]265}这几句诗取自南宋陆游所作《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诗中描写的便是苏轼的故乡眉山。根据陆游的描述,此处山脉蜿蜒,水流平缓,真可谓钟灵毓秀之地。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与自然生活的舒缓自在,也使得蜀地民风淳朴,有不愿出仕的传统。苏洵《族谱后录》云:“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及其后,僭伪之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5]386-387}苏辙《伯父墓表》云:“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6]414}苏轼《苏廷评行状》也有类似的表述:“自五代崩乱,蜀之学者衰少,又皆怀慕亲戚乡党,不肯出仕。”^{[7]497}可见,如此深沉的归隐情怀,对于苏轼而言,并不是自身产生的,而是当地文化传统的无意识积淀。

身处山水之间,苏轼深刻感受着由自然审美而带来的闲适自在之趣。苏辙《武昌九曲亭记》云:“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6]407}翩然独往,笑傲林

泉,酌水而饮,逍遥放纵,苏轼自小就在山水间体会到了自由洒脱的成仙状态。钟情山水、热爱自然,这当是源自他洒脱、豪放的本真个性。苏轼常作诗谈及自己的天真本性:“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1]384}，“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1]1593}，“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1]1718}……麋鹿象征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与显赫于官场的“伏辕姿”截然不同;“江海人”也与“市朝”人不同,苏轼可以安于“江海”,或曰“自然”,因为自然是他最原初的家园;“放浪”不是情感上的纵欲,而是“翩然独往,逍遥泉石”,在自然审美中放浪形骸。这一说法,类似于陶渊明的“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8]76},苏轼也作诗道“逝将江海去,安此麋鹿姿”^{[1]1928-1929}。可见,唯有山水自然才能使他本真自然的个性得以安适。

同样写于南行途中,《入峡》诗的后半段云:“蛮荒安可住,幽邃信难处。独爱孤栖鹤,高超百尺岗。横飞应自得,远颺似无贪。振翻游霄汉,无心顾雀鹤。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1]33}汪师韩认为“独爱孤栖鹤”以下十二句,“前六句就孤鹤写其高超自得之乐,后六句以我之局促与鸟之飞颺两相对照,作开合之势,知高超之乐,则知高遁之甘矣”^{[9]1812}。将要踏入官场的苏轼,已然预知自己终将囿于局促之态,而羡慕飞鸟自由的飞翔,远遁世间之外的闲逸心态。蛮荒众人嫌弃它的幽邃,苏轼却独爱其超远绝世、自在自得。处在蛮荒之中,仿佛整片山水都属于自己,苏轼以“孤栖鹤”为喻,所谓“孤栖”,一方面指的是不同于流俗,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万物毫无占有之心,只是孤独处世,不求其余。精神自由自在,虽包容天地也不算贪得无厌。“振翻游霄汉,无心顾雀鹤”,“游”即是《庄子》意义上的“逍遥游”,精神绝对自由,周游天地而不累;“无心”意味着自由洒脱,不累于物。紧接着,苏轼区分了两种生活:一是尘世生活,心神劳累、局促束缚;二是自然生活,身心解放,酣畅自得。所谓“富贵”,在众人眼中,只有奋进于人世间,才能最终获得;而在苏轼看来,审美享受于自然山水之中,也可以获得。众人之“富贵”偏重利欲,苏轼之“富贵”偏重自然审美。相比于官场的富贵荣华,他更羡慕飞鸟一般高遁天际、回归自由的审美生活。

这种自然审美的存在状态绝不只是对官场的抛弃,更重要的是对功利、拘束的存在状态的抛

弃。苏轼诗《虎跑泉》云：“亭亭石塔东峰上，此老初来百神仰。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至今游人盥濯罢，卧听空阶环珮响。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间去来想。”^{[1]476}虎跑泉在杭州，据《杭州图经》记载：性空禅师尝居大慈，无水，或有神人告之，曰：“明日当有水矣。”是夜二虎跑地作穴，泉水涌出，因号虎跑泉^{[1]476}。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欣赏虎跑泉，听泉水叮咚作响，“故知此老如此泉”，当下悟出性空禅师即虎跑泉。不执着于世间万事，超脱了人间烦扰，安心享受自然之乐事，与自然融为一体。“莫作人间去来想”，这便是苏轼的归隐之道——无需真正地回归自然、远离人世，而是从内心深处远离执著、分别之念，专心体会自然，享受当下闲适的自然审美生活。通过欣赏自然，苏轼将归隐的主角由外在形体转换至内在心境。于是，他归隐自然的实现方式，就不再是身体的回归自然，而是心境的归于闲适。正如冷成金所言，“苏轼则置换了‘兼济’和‘独善’的人格基础，即不论行‘兼济’还是行‘独善’，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对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建立在心理主义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10]339}。

苏轼理想的审美家园是彻底归于自由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是相互牵绊，而是相忘于江湖。苏轼曾借用《庄子》“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11]242}来阐发他的归隐之道，其诗云：

东池浮萍半粘块，裂碧跳青出鱼背。
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阔摇深吹苕带。吾僚有意为迁居，老守纵饒那忍脍。纵横争看银刀出，灩灩初惊玉花碎。但愁数罟损鳞鬣，未信长堤隔涛濑。濺濺发发须臾间，围围洋洋寻丈外。安知中无蛟龙种，尚恐或有风云会。明年春水涨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1]1787-1788}

此诗隐喻苏轼的当前生活与未来理想。他因不堪忍受京城的攻讦倾轧，主动选择外任，被派到颍州任知州，这一过程正类似于将鱼从东池迁移到西池之中。但正如庄子所言，与其互帮互助，不如相忘于江湖。无论东池、西池，都处于一种为人所控制的狭小空间中。苏轼盼望明年春涨湖水，可以让鱼游入大海，从而“相忘于江湖”，享受自由自在之存在状态。《庄子·达生》曰：“忘足，屣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11]662}“忘”，不是遗忘，

而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人与外界完全和谐相宜的自由境界。处在这一境界中，人不干涉自然，自然亦不远离人，人安适于自然之中。“好去相忘渺淮海”，这便是一种自由自在、圆融无碍的审美存在状态，这既是苏轼对归隐之道的形象表述，又是他自然审美的理想境界。

“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酬”^{[1]33}，在苏轼看来，美好与富贵不在他处，而在自然之中。所谓“尽解”，并不是主客对立式的阐释，而是如同飞鸟一般“振翮游霄汉”，如同鱼儿一般“相忘渺淮海”，也就是说，这实是自由自在的生命体验。知性是无法体认“林泉好”的，唯有真实地安处于自然之中才能实现。“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1]33}，苏轼的自然审美，不只是对万物形式之美的欣赏，更包含了对人栖居于自然之中这一存在状态的生命体验，成为他归隐自然的实现方式。

二、“此生定向江湖老”——仕与归

苏轼的官场人生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仕宦人生，二是贬谪人生。他的归隐之道，在这两种人生境遇中有着不一样的表现。就其仕宦人生而言，他尚能施展自身抱负，实现忠君报国的人生价值。他无需放弃官员身份，功成名遂早还乡是他此时所想。此时的归隐之道，是指在工作之余中暂时体会归隐之趣，以及早日报效国恩、回归自然。就其贬谪人生而言，他的归隐之道却有着不一样的表现。作为贬臣的苏轼，已然丧失了政治地位，既无法实现壮志，又无法真正归隐自然。此时的归隐之道，是指将被动贬谪视作主动归隐。那么，苏轼是如何暂时体会归隐之趣，又是如何将贬谪转化为归隐的呢？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我们发现，自然审美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分“仕与归”与“贬与归”两部分，详细探究苏轼作为归隐之道的自然审美。

尽管我们认为，隐逸文化的代表是道家与佛家，但事实上，儒家也有对隐逸问题的思考。《论语》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2]170}，“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12]261}《论语》还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12]665}《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3]891}可见，隐逸文化并非道释二家专属。不过，相对于道释二家对归隐生活本然地追求，儒家的归隐显得颇为不易。《孟子》云：“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

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13]307} 孟子不为齐王所用,故意停留三日,确知齐王仍未改变心意,才决心归去。可见,退隐,对于儒家而言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选择。这就导致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们难以下定决心彻底归隐自然,因此,文人的隐逸心理通常包含着矛盾的心理:既期盼在官场能有所成就,又期盼能够回归自然,享受生活。这一心理在唐宋文人那里颇具普遍性。即使是被苏轼赞为“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7]1517}的杜甫,也曾道出“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14]447}的隐退之语。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传统文人都有功成名遂早还乡的想法,但如果壮志难酬,那么就只好走进自然,在自然审美中感受暂远红尘的归隐之感。这一点在苏轼那里体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官场与自然在苏轼的意识中是不同的两种场所,他常将官场比喻为旅舍,而将自然看作家园。与之相对应的是,官场存在状态如同客居,而自然存在状态如同居家。

先来看苏轼对官场的看法,其间《临江仙·送王缄》云: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
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
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15]221}

此词作于熙宁十年(1077年),时苏轼自密州赴徐州任知州。知州,是多少沉迷官场之人的理想目标。尽管如此,苏轼仍称自己为“孤客”,称漂泊官场的状态是“此身如传舍”,不知故园好否,不知何处是“吾乡”。苏轼故乡就在眉山,因此,此处的“何处是吾乡”并不指忘记故乡所在地,而是指不知何时才能远离客居他乡之感,回归自然审美家园。

这不是苏轼一时兴起的感叹,身处官场,不得归隐自然,他常有身在旅舍之感。如“不羨京尘骑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1]598-599}，“此去宦游如传舍,拣枝惊鹊几时眠”^{[1]693}，“莫笑官居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1]702}，“床头枕驰道,双阙夜未央。车毂鸣枕中,客梦安得长”^{[1]1776}，“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时一顷。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1]1919}。“京尘”代指“官场”,位列高

官,享尽荣华富贵,终不如淮月弄舟更加轻松自在、自由洒脱。宋代官员移官频繁,奔波官场即为“宦游”。在苏轼看来,这种宦游人生即如身在“传舍”,像浮云一般漂泊不定;身在京城,繁华喧闹、车水马龙,苏轼尽管有自己的府邸,尽管与苏辙相对而住,但仍有客居之感,连做梦也不能安定。最后一首以“客梦”与“归老江湖”相对,更鲜明地彰显出客居官场与回归自然的不同。官场,始终未能带给苏轼一丝家园之感。

再看苏轼对自然的看法。其《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云:

东郊欲寻春,未见莺花迹。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舫舟桓山下,长啸理轻策。弹琴石室中,幽响清磔磔。吊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间世,何者为真宅。暮回百步洪,散坐洪上石。愧我非王襄,子渊肯见客。临流吹洞箫,水月照连壁。此欢真不朽,回首岁月隔。想象斜川游,作诗寄彭泽。^{[1]923}

苏轼为何如此羡慕归隐自然的生活?这是由于他通过亲身的自然审美体验,在自然中感受到了不同于客居官场的家园之感。苏轼一行人外出寻春,体会春风轻柔、流水依依;在碧绿的水面上泛舟,在静谧的石室中弹琴,舟行随意,琴声清圆。桓山是宋司马桓魋墓地所在地。《礼记·檀弓上》记载:“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16]108}人生总归成为泥土,无需讲究如此排场,自然而然即可。“悟此人间世,何者为真宅。”何为真宅?是富丽堂皇的府邸?苏轼以为不然。在他看来,所谓“真宅”,即是人最终归属的自然。因此,无需讲究排场,无需贪图富贵。回归自然,才算回归“真宅”。他作诗《野人庐》云:“少年辛苦事犁锄,刚厌青山绕故居。老觉华堂无意味,却须时到野人庐。”^{[1]677}少年劳苦田园,厌倦了青山绿水人家,外出求官一场,终究还是感觉华堂无味,渴望回归最初、最野的自然之庐。唯有自然,才能给予苏轼家园般的感受,让他体会到归隐之趣。

其次,当苏轼被束缚在官场时,自然审美是对他暂时的解救。唯有在自然审美中,他才能暂远红尘,暂时摆脱官场的制约,体会些许归隐的乐

趣,如其诗《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云:“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媮。”^{[1]179}为名利所役使而奔走劳作,未免太勤苦;为营求己身之安闲舒适,又未免太苟且怠惰。总之,二者皆非苏轼所求。他所寻求的是对官场与自然都不离不弃。那么,如何做到不离官场而近自然呢?就是将自然审美作为暂时远离官场的途径,其诗曰:“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1]179}“倦行客”在苏轼的语境中是对官场之人的描述。客居官场之中,寻求一份功名,未得而求得,既得又患失,最终弄得身心俱疲。但如果能够在工作之余回归自然,感受山水田园之美好,则如同旅行之中偶遇清流。虽然在官场中沾染的尘埃尚未脱净,但至少能获得暂时的休憩,“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嚶啾。鞅掌久不决,尔来已徂秋”^{[1]180}。远离官场,去感受万物生生之春意,这便是苏轼向往的审美活动。尽管未能成行,闲下来时已是秋季,但只要身处山水田园之间,仍然体会自由自在、如同回归家园的审美感受。官场生活是“劬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铍”^{[1]180},自然生活是“秋风欲吹帽,西阜可纵游”,一“劳”一“游”,足显存在状态之不同。“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1]180}一日乐便可慰藉百日愁苦,若是以自然为家,必然能使心中忧愁消散殆尽。

最后,苏轼的人生理想目标即是归于自由洒脱、与物冥合的审美家园。因此,功成身退、还归林泉是他的最终理想。他在《南乡子》中写道:“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15]190}他又在《水调歌头》中云:“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15]211}归隐自然的前提是“功成身遂”,并且一旦功成身遂,立刻抽身归隐,绝不贪图名利。苏轼在《水调歌头》序中说:“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15]211}在词中,他幻想着自己与弟弟苏辙的归隐生活:“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15]211-212}“佳处”指的不是官场富贵之地,而是自然山水美好之地。由此而言,苏轼理想的归隐生活必然少不了自然审美的存在。换言之,回到能够进行自然审美的山水佳景,才算真正的归隐。

因此,当我们翻阅苏轼描写自然审美的文学作品时,总能体会到他对终将归隐山水的期盼:

去蜀初逃难,游秦遂不归。园荒乔木老,堂在昔人非。凿石清泉激,开门野

鹤飞。退居吾久念,长恐此心违。^{[1]165-166}

新春阶下笋芽生,厨里霜螯倒旧罍。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园无雨润何须叹,身与时违合退耕。欲看年华自有处,鬓间秋色两三茎。^{[1]191}

微官共有田园兴,老罢方寻隐退庐。栽种成阴十年事,仓黄求买百金无。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如今似画图。邻里亦知偏爱竹,春来相与护龙雏。^{[1]271}

山前乳水隔尘凡,山上仙风舞袷衫。细细龙鳞生乱石,团团羊角转空岩。冯夷窟宅非梁栋,御寇车舆谢辔衔。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讪。^{[1]433}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久废山行疲苜蓿,尚能村醉舞淋浪。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1]580}

苏轼的归隐情怀是深沉的,上引五首诗,都作于苏轼年轻为官之时。正值事业上升期的苏轼,早早下定了未来要归隐林泉的决心。综合看上引五首诗,苏轼的自然审美已然超越了对象化的单纯观照,而是注重亲身融入的审美存在体验。这就使得他能够在自然审美中更好地体会居家自然的乐趣,释放埋藏心中的归隐思绪。具体而言,在第一首诗中,他来到了岐山宰王君绅的中隐堂,看到清泉石上流、野鹤任意飞,顿时勾起了藏在心中的归隐之心。在第二首诗中,他与苏辙互相唱和,自己在官场不得自由,而苏辙在家中种蔬,享受田园的美好,两相对比,产生退耕的想法。第三首诗也是受朋友草堂园林的吸引,而产生归隐之情的。最后两首都写于他任杭州通判之时。受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苏轼的政治生活颇为坎坷。他无时不想早日回归自然。官场倾轧和人间忧患,让他力不从心。但是,当他走进杭州山水中时,他感受到了“山前雨水隔尘凡”,仿佛进入仙境。久在官场,身心疲惫;进入自然,即使路途劳累,“尚能村醉舞淋浪”。官场永远是束缚的,自然却永远是自由的。正是由于他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如此舒适、自在的审美体验,他才下定决心永脱讥讪,消逝于自然之中。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1]1870},澹月倾云、风吹浪来,面对如此自然、如此美好的山水佳景,

自己为何还要在官场漂泊不定呢？苏轼发誓，此生一定要终老江湖。尽管这一誓言终未实现，但他毕竟通过自然审美，体会到安居自然之中的审美乐趣，在心理上实现了自己归隐自然的心愿。

三、“喜我归有期”——贬与归

苏轼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数他的贬谪生涯。唐宋时期，贬谪成为文人常态，韩愈被贬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欧阳修被贬滁州。这些文人被贬出朝堂，对朝廷政治当然是不利的，对他们自身而言，却是一次回归山水田园的好机会。不过，贬谪并不意味着彻底远离官场，归隐林泉。苏轼被贬黄州时，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17]460}，前两句皆为虚职，只有后两句才是关键：一句表示不能擅自离开黄州，一句表示不能享有政治权力。尽管如此，但苏轼毕竟远离了权力的争斗场，更加亲近自然山水。从这一意义上讲，贬谪未尝不是一次不那么彻底的归隐。当然，是否将贬谪看作归隐，这完全取决于被贬者。韩愈被贬潮州，便自觉此生休矣，作诗予侄儿：“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18]573}柳宗元则不然，他作诗道：“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19]1195}，“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19]1213}，“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19]1213}。“幸”，意为幸运、幸亏，这是他对贬谪的态度。万幸遇到贬谪，才能独享自然审美之趣，苏轼也是如此。尽管他时不时表现出悲戚之情，但总体看来，他还是将贬谪看作回归自然的机会。这其中蕴含着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过程：贬谪是被动的，而回归是主动的；就官场生活而言是贬谪，就自然生活而言却是回归。细读苏轼的作品，可以发现，这一转变，也源自于他那作为归隐之道的自然审美理念。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贬赴黄州，至陈州时与苏辙相见，分别之际，赠诗道：“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1]1019}苏轼被贬黄州、苏辙被贬筠州，两州仅一江之隔，无需道别。既然已经被贬，那便随遇而安，做一个黄州的老百姓，无需回归故乡了。刚刚经历人生劫难的苏轼，言语中自然有着无奈、自嘲之意。但这种无需归故乡，安心作黄州之民的想法不见得一定是绝望之言。毕竟他在之后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类似的感叹。他紧接着创作的《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

二首》便又一次表达了这一思考：

兰菊有生意，微阳回寸根。方忧集暮雪，复喜迎朝曦。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至今行吟处，尚余履舄痕。一朝出从仕，永愧李仲元。晚岁益可羞，犯雪方南奔。山城买废圃，槁叶手自掀。长使齐安人，指说故侯园。

铅膏染髭须，旋露霜雪根。不如闭目坐，丹府夜自曦。谁知忧患中，方寸寓羲轩。大雪从压屋，我非儿女萱。平生学踵息，坐觉两踵温。下马作雪诗，满地鞭捶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道逢射猎子，遥指狐兔奔。踪迹尚可原，窟穴何足掀。寄谢李丞相，吾将反丘园。^{[1]1019-1020}

雪后晴天，如同苏轼此时的心境。迎着朝阳，他免不了想起自己在故乡的生活。那座温馨舒适的南轩，是苏轼对故乡最美好的回忆。《梦南轩》道：“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7]2278}南轩之外，一派自然。阳光穿过松竹照到屋内，葵与萱长满院子。如此美好的自然场景自己没有珍惜，反而外出走向仕途，如今还蒙羞被贬。不过，苏轼不愿一直沉沦于被贬谪的悲哀中，而是通过积极转化，将贬谪之苦转化为归隐之乐。朝廷只能打击自己的外在，但左右不了他的内心。“长使齐安人，指说故侯园”，“寄谢李丞相，吾将反丘园”，他又一次决定安心做一名黄州的百姓。在写予苏辙的诗中，他尚且无奈地说道“何必归故丘”，故乡与黄州隔了一层；但此时，他说“吾将反丘园”，这分明是将黄州与故乡融为一体。事实上，苏轼在黄州也是如此做的，他努力地让黄州变成自己的故园。他写给赵晦之的信中说：“藤既美风土，又少诉讼，优游卒岁，又复何求。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7]1711}黄州人事和谐，风景美好，可以优游卒岁，无需他求。谪居多年，苏轼已经安于其中，假设自己原本就是黄州人，未曾出仕，也就是如今的状态。

将目光转向苏轼在黄州创作的山水文学作品，我们发现，他在黄州进行自然审美时，常常生发出已然归隐自然之感。其诗《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云：“我来黄冈下，欹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向我如咫尺。春蔬黄土软，冻笋苍崖坼。兹行

我累君,乃反得安宅。”^{[1]1127}王巩因“乌台诗案”被贬岭南,苏轼一直愧疚。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并不认为被贬黄州是多么悲惨之事,乘舟碧江上,攀爬武昌山,躬耕东坡处,这又一次证明了苏轼自然审美的最终旨归,不仅是获得审美愉悦,更重要的是感受归隐家园的审美之趣。苏轼视官场为“客舍”,视自然为“真宅”。“宅”,即自然家园。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7]1671},带给苏轼的必然是家园般的美好体验。在他看来,黄州是理想的终老之地。其诗《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云: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江流镜面净,烟雨轻幂幂。孤舟如凫鹭,点破千顷碧。闻君在磁湖,欲见隔咫尺。朝来好风色,旗脚西北擿。行当中流见,笑眼清光溢。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欲买柯氏林,兹谋待君必。^{[1]1052-1053}

御史台监狱阴冷、拘束,象征着过去所经历的烦扰芜杂的官场生活。而今贬谪黄州,苏轼却认为是“乐事”:欣赏着波澜不惊,又烟雨朦胧的江面,孤舟泛江,点破千碧。为何黄州可老,只因有修竹泉石。这些自然物并无多少功利价值,但却有着无可比拟的审美价值。天天与自然为伴,这怎能不算归隐?

陶渊明曾五次出仕,最后一次出仕后,深感“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8]460},遂创作了《归去来兮辞》文,此文可视作他的归隐宣言。苏轼在黄州改编此文,创作了词《哨遍》,也可视为他的归隐宣言。该词云: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

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15]389}

外出为官,身心俱疲,不如归隐自然。拄杖远观,但见孤云飞鸿。自然是毫无功利之心的,云无心出岫,鸟倦飞知还,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无任何思虑。“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这既是隐括陶文,又是苏轼对自己在黄州进行审美欣赏的描述。苏轼的自然审美,绝非静止旁观,而是步入自然,融入自然,全身心地感受自然的美好。苏轼感叹自己为何要惶惶不可终日,为何要汲汲寻求功名?荣华富贵并非自己志向,能够在山水之间痛快地啸咏歌唱,在林泉之间自由地饮酒酣醉,这才是真正的富贵。这类富贵无需通过龙争虎斗、刀光剑影来争夺,而是通过在洒脱的自然审美来体会。

绍圣年间,苏轼又一次遭遇贬谪,这次被贬得更远。依朝廷的意思,贬谪地越远,被贬者的内心应该越痛苦。但恰恰相反,越贬越远,意味着离官场越来越远,同时也意味着离自然越来越近。因此,在贬往岭南的路途中,苏轼感觉处处是家。他作诗云:“清远聊为泛宅行,一梦分明堕乡井。觉来满眼是湖山,鸭绿波摇凤凰影。”^{[1]2557}《新唐书·张志和传》:“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蔽漏,请更之,志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20]5609}“泛宅”指的就是自由自在地游荡于山水之间,如同安家于山水一般。尚未到贬所,苏轼便已通过自然审美体会到了归隐之乐。

到达惠州后,苏轼安居于此,在山水田园中享受生活,仍然有一种已经归隐家园的感觉。《丙子重九二首·其一》云:“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蛮菊秋未花。惟有黄茅浪,堆垅生坳窞。蟹酒藁众毒,酸甜如梨楂。何以侑一樽,邻翁馈蛙蛇。”^{[1]2203-2204}重阳登山,田园种菜,苏轼优哉游哉地生活于自然之中,生发出归家之感。而唱和陶渊明《归园田居》,更加说明他已经将贬谪惠州看作归隐田园。《和陶归园田居·其二》云:

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江鸥渐驯集,蜃叟已还往。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提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1]2104-2105}

猿猴投入森林,疲马解开马鞍,这两句诗比喻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回归到本来的天性状态。苏轼在惠州心境闲适,温饱自足,赏江鸥驯集,看渔民往还,逍遥自在。池塘种植荷叶,山岭种植紫笋,这种田园生活苏轼在黄州已经有所体验,如今又一次回归。“我醉堕渺莽”即是“相忘渺淮海”,也就是一种人与自然完全融合的审美存在状态。“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1]2194}岭南的南国风光,让苏轼流连忘返。通过自然审美,他已将令人痛苦的贬谪,转化为积极乐观的归隐。

好景不长,苏轼又被贬谪至儋州。但此时的苏轼,已然不再有痛苦之感,只觉更加接近自然之家。他作诗云: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1]2246-2248}

这首诗写出了苏轼的心路历程。“中原”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代指朝廷。四顾途穷,苏轼自知或许终生不会重回朝廷恢复正常身份。不过,这种思绪没有持续太久。海上天风袭来,千山震动,万谷鸣响。如此震撼的自然场景是苏轼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它强烈地激起了苏轼的审美豪情。苏轼认为这是群仙天宴的有意安排。为何有如此安排呢?只因“喜我归有期”。“归有期”,从时间维度上看,指的是生命临近终止,将要返归天庭;从空间维度上看,彰显出苏轼对贬与归的思考。被贬儋州,是朝廷对苏轼施加的无以复加的责难,但在苏轼看来,这是回归有期的体现,不应悲伤,而应欣喜。不能回归朝廷,难以回归故乡,那便回归自然。被贬儋州的苏轼,将贬与归完全融为一体。冷成金认为,此处的“归”“是指精神有所‘归’,是用审美的方式搭起了通向永恒的桥梁”^{[10]346}。苏轼的回归不是彻底地归于自然,而是从审美意义上的回归,山水佳处即是归隐之家园。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道出了“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1]2363}之语。

“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1]2283},苏轼认为

自己是玉堂上仙,下凡贬谪儋州。他还指出:“天人几何同一沓,谪仙非谪乃其游。”^{[1]1995}“谪仙”表面是“谪”,实际是“游”,即自由自在地优游于自然之中。不是倾向于对立的“观”,而是指向存在体验的“游”,这实是对苏轼自然审美的高度概括。正所谓“谪仙非谪乃其游”,苏轼在悠游自在的自然审美中,转“谪”为“游”,从而消解了遭黜贬谪的悲剧情感,实现了自己的归隐之愿。

苏轼的归隐之念是深沉的,他之所以向往归隐,不只是因为对官场倾轧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他对回归自然本性的渴望。归隐,对于苏轼而言,不只是地理位置的归属,更是对本真自由存在状态的回归。正因为如此,他没有选择古代隐士那样远离人间、归隐林泉的道路,而是选择在自然审美中实现归隐之念。苏轼的自然审美超越了对审美对象的主客对立式观照,指向了对审美家园的存在论体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然审美成为他归隐自然的实现方式。在他身居高位时,自然审美使他暂时远离烦扰芜杂的官场,他由此生发出渴望在自然山水中安家的审美愿望;在他遭黜贬谪时,自然审美使他转贬谪之苦为归隐之乐,他由此安心体会于自然山水之间,获得自在畅游的审美体验。

苏轼作为归隐之道的自然审美,无疑可给予当代自然美学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以归隐自然为理想目标,提高了自然审美的价值,使自然审美不再只关注于独立的对象,更倾向于对美好存在状态的体验;其次,在自然审美中融入家园意识,使自然审美获得了生存哲学的意义;最后,以自然审美实现归隐之道,转烦恼人生为审美人生,转内心之苦为身心自由,这无疑彰显了自然审美的心理治疗功效。

参考文献:

- [1] 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王水照.苏轼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3] 纪昀.苏文忠公诗集[M]//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 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 苏洵.嘉祐集笺注[M].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6] 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

- 华书局,1990.
- [7]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9] 汪师韩.苏轼选评[M]//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0]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 [11]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2] 刘宝楠.论语正义[M].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3] 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4]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5]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6] 朱彬.礼记训纂[M].饶钦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7] 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8] 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9]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On Su Shi's Natural Aesthetic as a Way of Seclusion

LIU Hanjun

(Research Center for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Su Shi's natural aesthetic goes beyond the simple observation of aesthetic objects, but points to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returning to the hidden natural homeland, which is the realization way for him to return to nature. The reason why Su Shi has such deep feelings of seclusion is not only that the officials jostle against one another, but also that he is tired of fighting for fame, and advocates the natural aesthetic life with leisure and ease. When he was a senior official, he briefly felt the pleasure of retreat to nature through natural aesthetic, and vowed to return to nature eventually. When he was dismissed and relegated, he relieved the tragic emotion through natural aesthetic, turned the pain into the joy of seclusion, and truly felt the comfort of natural homeland. Su Shi's concept of natural aesthetic is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natural aesthetic, and has the certain meaning of survival philosophy.

Key words: Su Shi; way of seclusion; natural aesthetic; to be an official; relegation

(责任编辑 雪箫;实习编辑 郑安然)